

欧文·斯通著

董秋斯译



马背上的水手

杰克·伦敦

马背上的水手

杰克·伦敦传

[美] 欧文·斯通著

董秋斯译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王 眉

马 背 上 的 水 手

杰克·伦敦传

〔美〕欧文·斯通著 董秋斯译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850×1168 1/32 9.125印张 3插图 210千字

1959年1月北京第1版 1982年6月北京第2版

1982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5,801—36,800册 定价0.80元

译者序

十九世纪最后十年间，科学社会主义、现实主义文学、进化论生物学，在欧洲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。但是资本主义后起之秀的美国，对于以上三种现代文化，不仅是一片处女地，也是一片禁地。

在那时的美国，关于私有财产和财富分配的原则，即便只是讨论一下，也是犯禁的。工业家和银行家依旧保持君权神圣的观念。工人们要相信，工作和面包都来自雇主的智慧和善心，应当加以感激。教会是工业的大腹侍婢，大学里所谓高等教育也没有两样，其中所宣传、所讲授的东西，都要经过雇主的许可。即使有若干知识分子，知道世间有所谓社会主义，也不过拿来在私人客厅里谈谈而已。而且所谈的也仅限于教育、立法、选举等和平渗透，革命两个字是谈不到的。

这时美国文学面临到一个衰竭的时期，维多利亚^①王朝的风尚已经僵化成一定的模子，再加上中西部道德的束缚，文学家写不出有创见的作品。他们所写的对象，限于可敬的中产阶级或富人，善行永远受赏，恶行永远受罚。他们主张只看人生的愉快面，避免一切粗暴、严厉、卑污、真实的东西。如杰克·伦敦所说，他们这些人是乏味的，孱弱的，肚子里没有脏腑，两腿间没有

① 英国女王，生于1819年，死于1901年，1837年继位为王。

生殖器。他们没有创造力，没有工作哲学，没有真知灼见；他们所有的只是一种用在甜甜蜜蜜的传奇故事上的公式。他们是使文学贫乏的贫乏了的头脑。而当时美国最走红运的作家就是这些人。

至于进化论，因为它揭穿了基督教的神话，美国清教徒社会视之为亵渎神圣者穷凶极恶的诡计。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今天，美国依旧有若干个州立下法律，禁止学校中讲授进化论。半世纪以前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。

就在那样的时代，那样的地方，居然有一个人，不顾统治阶级的势迫利诱，敢于冒犯他们的权威，强迫他们接受他们所禁忌的社会主义、现实主义、进化论，同时用了易于了解的形式，把这三种东西交到劳动大众的手上，为他们指出一条解放自身的明路。这个人的名字就是杰克·伦敦。

杰克·伦敦用来表达思想的主要形式是小说。他在小说中写社会主义，写进化论，写实实在在的人生，写贫血的、纤巧的、怯避的、伪善的十九世纪文学所不敢正视的一切东西。由于他那长于说故事的天才，也由于他学习前辈大家的努力，他锻炼成一种文学技巧，足以攻下顽固分子的森严壁垒，也侵入了暖室一般的太太小姐的深闺。这在美国，确实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！

杰克·伦敦是美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小说家，被人称作“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之父”。关于这一点，一九二九年的《新群众》(New Masses)作过很确切的说明：

“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，不应当止于写无产阶级，也应当写能为工人阶级所阅读的作品。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，不应当止于用无产阶级生活作材料，他的作品应当燃起反抗的精神。杰克·伦敦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——美国第一个也是到此为止唯一有天才的无产阶级作

家。能读书的工人们，都读杰克·伦敦的作品。他们是他们都读过的一个作家，他是他们大家共有的一个文学经验。工厂工人们、农场工人们、海员们、矿工们、报童们都一再读他的著作。他是美国劳工阶级最有声望的作家。”

法国的法朗士(Anatole France)^①称杰克·伦敦为美国的马克思，并且在他为《铁蹄》作的序中说道：“杰克·伦敦具有看出普通人看不见的东西的特殊天才，也具有使他能预言将来的特殊知识。”

这评语对任何时代的文学家都要算作最高的称誉了。二十年来，法西斯恶魔用了空前卑劣、空前残暴的方法，谋杀觉悟了的人民大众，扫荡现有的文化成果，看了《铁蹄》，我们几乎疑心是今天写的。杰克·伦敦预言未来的能力，可以从这上头看出来。

我们上面强调杰克·伦敦小说中思想的成分，并没有意思说，他的著作与普通宣传品有任何相同的地方，因为他的主要作品乃是真正的文学艺术。只有这样，他的作品才能受到当时最广泛的诵读，连他最看不起所谓的大家闺秀都要在锁起的门后边放下窗帘来读呢。

他的作品流传，并不以英语民族为限，在他生前，已经译成十余种不同的文字，目前似乎没有一个有文学的民族不曾与杰克·伦敦结缘了。尤其是在苏联，连拥有四十种方言的译本的雨果(Victor Hugo)，也不能与杰克·伦敦比肩。在十月革命时期，杰克·伦敦在苏联达到偶像化的地步，到处可以看到他的作品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他的作品更为流行。苏联青年飞行家最嗜读的作品，也是杰克·伦敦的。许多有名的战时小

① (1844-1924)，近代法国小说家，共产党员。

说，如科谢夫尼珂夫 (Вадим Кожевников) 最受欢迎的《三月——四月》，很显著地受了杰克·伦敦那雄健风格的影响。

杰克·伦敦出身于劳动者的家庭，既没有家学，也没有外援，更没有资产，连中等教育都不曾受过，举凡世人借以成就事业的东西可以说一概没有。他只有一种普通人所没有的东西，那就是到处受人轻视的私生子身分！一个普通人处在他这样的境遇，能够做到仰事俯蓄，免于冻馁，也就很不容易了。但是杰克·伦敦在短短的四十年间，不论在著作方面，在事业方面，都有了震古铄今的成就。他究竟凭借了什么呢？

诚然，杰克·伦敦有他得天独厚的地方，就是脑力强大，体魄健全，能通晓常人不易通晓的东西，能吃常人吃不消的苦。但这不是最主要的成功条件。具有这种条件的人，我们随时可以见到，而杰克·伦敦却是百年一遇的伟人。我以为杰克·伦敦最杰出的地方，就是他那不屈不挠的青年气概。

杰克·伦敦是青春的化身，连他的错误，连那些使他一再受挫折的弱点，也是属于青春的。他的朋友说他是一个长得太大的孩子，乃是一句无法变更的评语。因为他永远是一个青年，所以他能不计利害，不畏险阻，敢于冒犯社会上的旧势力，敢于推翻思想界的偶像。至于他学习的努力，工作的认真，更是充满了朝气。他说，人生是斗争。不错，杰克·伦敦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。

杰克·伦敦的著作，受到各国青年人普遍的爱好，因为其中提供了面向人生而与之交锋的勇气。但是他最好的著作应当是他的生活，用他的生命写成的书。我们现在见不到杰克·伦敦这个人了，只能读他的传记了。杰克·伦敦有过写自传的企图，并且已经定下了《马背上的水手》的题名。可惜，过早的死使他未能完成这个计划。二十年以后，欧文·斯通 (Irving Stone)

负起了这一项任务。

斯通度过与这部传记的主人公几乎同样丰富的生活。一九〇三年，他生在旧金山^①著名的电报山。他降生的地方与杰克·伦敦降生的地方，相差不过掷石之遥。与伦敦相同，他也靠了做报童开始维持自己的生活。后来他靠了做服装店的跑街、皮货店的牧童，赶菜车、开电梯、暑假时从事果园工作，读完中学。然后又靠在乐队里奏乐、赶货车、在旅馆里站柜台、在肉食厂里打包、在电力厂做工、在运动器具店做卖货员，读完大学。他所进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也正是杰克·伦敦进过的。关于写作这一部杰克·伦敦传的经过，他作过下面的叙述：

“我试图写杰克·伦敦的传记，为时已经很久了。现在，经过这许多个月对杰克私生活彻底的研究和探讨，我比以前更爱他，也比以前更钦佩他了。我知道他的过失和弱点，我决心把它们都写出来，因为我太爱他了，不能加以粉饰。他是太伟大的一个人，不可以不老老实实在地写他。茶弥安·伦敦（杰克的后妻）和伊丽莎·伦敦·希伯德（杰克的异父异母姐姐）把杰克手写的笔记、通信、证件、商业文书、原稿等全部移交给我。在这两个女人之外，没有一个人见过其中的一个字。此外，她们曾把价值三万元的私人文件卖给罕廷顿图书馆，规定在她们两个死以前不得发表，这时她们连这一部分也都转让给给我。凡在杰克·伦敦生活中演过重要角色的每一个人，我都加以寻求，加以访问，从他们取得资料。我有时觉得，这些人为了使杰克·伦敦的传记圆满无缺，才都活在世界上呢。”

读过斯通这一部传记后，我相信他上面的话是诚实的，没有

① San Francisco，新译圣弗兰西斯科。美国西部金融中心，对远东贸易的要港。

夸张的地方。他的确尽可能运用他所能到手的材料，也的确尽可能忠于有关的史实。作为一个传记作者，能达到这地步，已经是难能可贵了。假如我们一定要对他苛求的话，我们可以说，他的学力比不上他所写的角色，因而不能把杰克·伦敦思想上的造诣画一个明晰的轮廓，更不必说从更高的境界加以批判了。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缺点是，他对决定一个人的思想行为的社会因素，未能加以适当的注重，因此他所写的人物，有时不免使人觉得离奇古怪。实际上，每一个貌似离奇古怪的现象，都具有一定的原因，待研究者加以发掘。斯通的传记中，屡屡提到先天遗传的影响，固然有一定的道理，可惜所能解释的现象非常有限，另外一大部分，要求之于他所写的那个人物的社会的存在，这又似乎超出作者的能力之外了。

一九三三年，苏联印行杰克·伦敦的《铁蹄》，卷首载有瓦扬-古久里(Paul Vaillant-Couturier)的一篇序，其中颇有一些精到的意见，可补本书论点的偏颇，不妨摘译一点，供读者参考。

序文中首先揭出杰克·伦敦说明自己立场的一段话，未经斯通采用，我以为应当补在这里：

“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，第一，因为我是生就的普罗列塔利亚^①，也久已发现，社会主义是普罗列塔利亚唯一的出路；第二，当我不再做普罗列塔利亚而成为一个寄生虫(假如你喜欢，可以唤作一个艺术家的寄生虫)时，我发现，社会主义乃是艺术和艺术家唯一的出路。”

这一番话说得很恰当，也很坚决，但是他的行为却有许多地方与这一番话不相类。个人主义时时在他的头脑中占上风，悲观和厌世也常成为他思想的主调。不错，他是受了尼采主义的

① Proletaire, 法文, 意为无产者。

影响，不过这不会是根本的原因。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头脑中，居然容得下尼采主义，而不能加以抛弃，表明他的头脑中原有一种空隙，他所信仰的是一种病态的社会主义。

不待多说，一个纯正的社会主义者绝对不应当、也不会悲观和厌世。杰克·伦敦是何等生气洋溢的一个人，终于不能免除这两种病态思想。他在《铁蹄》中预言，革命失败之后，《铁蹄》（法西斯主义的化身）能维持三百年的血淋淋的统治！他个人时时感到死的诱惑，终于用自己的手结束了他那方当盛年的生命。这在一个社会主义者，可以说是一种罪过。斯通一味用生理的、心理的原因来作解释，是根本不够的。我很同意瓦扬-古久里下面的话：

“杰克·伦敦写作（《铁蹄》）的精神，是浸染当时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的精神。《铁蹄》写作于一九〇七年。这部书是在一九〇五年红俄亡命者所造成的气氛中写成的。杰克·伦敦一向从俄国方面——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中有积极参加第一次俄国革命的人——吸取革命的灵感。很显然，在革命失败以后，他就要受他们那沮丧情绪的影响了。此外，虽然杰克·伦敦原本是一个工人，后来却由于他那文学地位，与资本家们有过接触，他从经验中，从这两个极端，认识了当时蒸蒸日上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力量。他把美国的资本主义拿来与俄国那退化的、专制的、初期的资本主义作了比较，当他瞻望《铁蹄》在他自己国家中的胜利时，他不能不想到一个远更经久、远更标准化、远更合理化的压迫形式了。”

不过，这种悲观思想究竟是没有客观根据的。

“就在杰克·伦敦写作《铁蹄》的时候，列宁正在一步一步地正确地打击革命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悲观思想。列宁久

已在他所写的《怎么办》一书中规划出一个革命党的组织和活动的主要路线了。他不肯用溃灭两个字形容一九〇五年的失败。他主张参加沙皇议会的选举，借以取得仅存的合法便利。他打击波格丹诺夫^①、卢那察尔斯基^②集团的概念论、机会主义、过左的路线。他已经预先看出由一九一二年列纳罢工所表明的革命的觉醒。”

不幸杰克·伦敦不曾有机会认识列宁，不能在思想上接受他的指示，由着当时流行的不正确的思想，不应有的情绪毒害了他的作品，甚至戕杀了他的生命。不论从革命的观点上说，从文学的观点上说，都是世界人类的一大损失！

然而杰克·伦敦毕竟是不平凡的。他从来不相信和平主义的催眠歌，他也不相信和平革命一类的欺骗性的许诺。他用退党来抗议当时美国充满妥协性的社会党。

世界各国，有多少革命斗士，先进作家，达到中年时，为了统治阶级一点残羹冷炙，为一席“翰林院”中的地位，进入了妥协的阵营，采取了貌似“中立”，终于带上狗头领，一面乖乖地守门，一面用舌头舔统治者那挥舞鞭子的手。杰克·伦敦不是这样的！

杰克·伦敦终生以生于工人阶级、属于工人阶级为荣。资产阶级给过他广泛的名望，大量的金钱，极尽诱致的能事。诚然，他有时气短，有时悲观，有时满腹牢骚，有时似乎要对统治阶级屈服了。但是在最紧要的关头，他作了词严义正的表示，使一切存心罗致他、诬蔑他的人们，不能不望而却步：

“我不再存向上爬的心。我对我头上这堂皇的大厦不感任何兴趣。我所关心的乃是这大厦的基础。我甘心在那里手执铁槌与知识分子、理想主义者、有阶级意识的工人

① А. А. Богданов(1873—1928)，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。

② А. В. Луначарский(1875—1933)，苏联政治家、文艺评论家。

们并肩劳作，时时得到一条有力的杠杆，使那全部大厦动摇起来。有一天，当我们得到更多的几只手、更多的几条杠杆来从事工作时，我们就要把它连同它所有的腐烂生活、未埋掉的死人、可憎的自私心、损人利己的实用主义完全推翻。那时我们就要把地下室扫除干净，然后建造一所人类的新居，其中再也没有特等房间，所有的房间都是光明的，畅爽的，在那里所呼吸的空气将是清洁、高尚、活泼的。”

这一番话是杰克·伦敦的《息壤誓言》，也应当是一切革命知识分子的《息壤誓言》。虽然这几句话未经斯通采入他所写的传记中，但我现在翻译这部书，把杰克·伦敦这个人介绍给我国的青年，主要还是因为杰克·伦敦说过这样的话，而且也实践了他的话。

董秋斯

1947年12月20日

一八七五年六月初的一个早晨，旧金山的人们一醒来，就读到《纪事报》(Chronicle) 上一段惊人的故事。一个女人开枪打自己的太阳穴，因为她的丈夫“把她赶出家庭，因为她不肯打掉她怀着的胎儿——一页薄情史，一页家庭变故史”。那个女人是芙罗拉·威尔曼，俄亥俄州马西隆的垦荒者威尔曼家的害群之马；这个男人是詹尼教授(Professor W.H.Chaney)，巡游的爱尔兰占星家；那个胎儿后来成为驰名全世界的杰克·伦敦。

《纪事报》上的记载，虽然在末一行承认，这故事是由芙罗拉那方面的朋友透露出来的，却一致地抨击詹尼。他受人指责说，他坐过土墓斯的监狱；埋葬过几个老婆，“头上一丛青草，脚上一块石头”；^① 强迫芙罗拉去替别人洗衣服和看孩子；卖掉她出钱买的家具；命令她离开家庭，她不肯走，就抛弃她。这些话的不合实际与《纪事报》的新闻标题相同，那标题是：《一个弃妇》；实际上芙罗拉·威尔曼从来不曾与詹尼教授结过婚。

芙罗拉原本没有多少自杀的意思。她只受了一点皮肉伤。那一颗子弹给詹尼的伤害比给芙罗拉的却大得多了，因为全国的报纸转载那个故事，使得詹尼的余生在痛苦和耻辱中度过。他不久就离开旧金山。杰克·伦敦永远不曾见过他的父亲。

当《纪事报》的新闻发表时，芙罗拉·威尔曼大约有三十岁。她是一个矮小、丑陋、强壮的女人，她经常戴眼镜和假发，因为一

① 莎士比亚剧本中的话。

场伤寒症使她失去一大部分的视力和头发。她生有大鼻子，大耳朵，苍白皮肤，不喜欢装饰。芙罗拉出身于优良的威尔斯族，她的祖母，佐厄尔·威尔曼太太，领着四个孩子，在一八〇〇年后的一个仲冬，跨过阿勒格尼山，由纽约州的卡南德瓜到俄亥俄州的韦恩县，这乃是一条需要精力、自信和勇气的路程。

佐厄尔·威尔曼太太的两个儿子，希兰和马勺尔，禀赋了这些特性。马勺尔就是杰克·伦敦的外祖父。在旅行克利夫兰的时候，他们在晚秋乘船去浦廷湾里的一个岛子。那条船回来时不曾在那里停留，而且是那年最后一趟旅行，于是那两个少年被抛弃在那个荒岛上，既没有食物，又没有住处，而且冬天就要来了。用了他们仅能用石头和浮木作成的工具，他们做了一条筏子，这条筏子不仅把他们运上本土，而且一直驶到克利夫兰。

马勺尔·威尔曼定居在俄亥俄州的马西隆，他在那里修运河，取得新发明的专利权，其中主要的一种是威尔曼煤炉，因此积聚了不少资财，在马西隆建造了一所十分美丽的住宅，他的女儿芙罗拉就生在里边。

芙罗拉·威尔曼具有她那时代所有的好处。她学的是音乐，入过交际学校，读书很多，精通英文，态度也很文雅。因为是富有的威尔曼家的女儿，她大可以选择一个丈夫，照她的兄弟姊妹的样子，安安稳稳地过一种顺利而安定的生活。但是那架机器有一个地方滑脱一个轮齿；作为马勺尔·威尔曼那样聪明的发明家，竟不能想出一种使他的女儿安分守己的办法。据她的朋友们说，她是一个聪明而有智力的女人，同时是一个神经病人，一个感情不安定的女人，她很难使自己受任何一定的约束，或遵循任何一定的方向。她在二十岁上所患的斑疹伤寒，据说，使她的脑筋陷入失调状态。

在二十五岁上，芙罗拉把她所有的东西都装进一个手提包，

离开了马西隆。一个未婚的少女这样行动，是前所未有的事。直到她死，她永远都不曾与她的父母通信，她的父母也不曾给过她信。没有疑问是有一番争论的，但是争论的确实原因只能加以推测了。独出心裁的《纪事报》记者说，“当詹尼教授由陆路走过传奇性的西部时，她来到这个口岸”；但是芙罗拉在三年以后才与詹尼在西雅图相遇。在那暗昧不明的三年中，她从这一个城市到那一个城市，靠教钢琴课维持生活，我们但愿能追随她的行踪；现有的证据使我们相信，那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故事。

詹尼教授写道：“人们都知道，芙罗拉是我的太太，她过去却以李·斯密的太太的名义，住在同一公寓中。那是一个很高尚的地方，一天，当我回家时，我发现所有房客都向外搬，全公寓出现了很大的波动。我一走进室内，芙罗拉就锁起门来，跪在我前面，一面呜咽，一面求我饶恕她。我说，我没有什么可饶恕的。最后，经过很多的迁延和辩论，她承认了李·斯密的关系，并且说，房客们所以搬走，因为她差不多同时以威尔曼小姐、斯密太太和詹尼太太著称。假如我顺从我最早的意见，我那时就离开她，可以免去多年的灾难。不过我自己的生活在乱七八糟的，想了一下，我就饶恕了她。”

詹尼在西雅图的耶斯勒市长家初次遇见芙罗拉·威尔曼。耶斯勒来自俄亥俄，与威尔曼家相识。芙罗拉与耶斯勒市长和他的太太同住；他们告诉詹尼说，她来自很高尚的家族，但是她做过一件错事。这未说明的错事大概就是芙罗拉离家的原因。詹尼与耶斯勒家相好；他常去他们家；当他后来在旧金山遇见芙罗拉时，他们就成了老朋友。

杰克·伦敦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关于他的祖先，我们一无所知，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纯血统的爱尔兰人，生在缅甸的一所木屋内。他在海上度过许多青春的岁月。他是一个短小精

悍的人，在六十岁上，有人派了一个暴徒去打他，他还能把他打下楼梯去。他以写作、编杂志、演讲、教书、算命来度日。他收集了很多哲学、算学、天文学、占星术的书籍。他是一个语言学家，一个历史和《圣经》的优秀学者。在他的朋友、学生、门徒中间，他是以杰出人物著称的；大家承认他是最好的算命者之一。在芝加哥时，据说，这个老年人，每天差不多有十六个钟头，把他那伟大的精力用在占星术上。他对占星术有一种热烈的真正的信仰。他把占星术看作正确的科学，与化学和算学相同，一种可以使人类脱离困苦的科学。

詹尼最大的弱点是女人。当他的朋友责备他道德堕落时，他就指着他的命宫图大叫道，“哎呀！这是我命中注定的。”他很容易发脾气，难于相处，因为他一向是首脑、领袖和先生。他一生大部分在贫困中度过，因为他不善于用钱，当他的学生们穷得付不出学费时，他就白白地教，而且不断地把他所有的一点资产送掉。

他的学生们证明，他的讲解总是很引人注意的，因为他的话有内容，而且是用一种愉快的态度说出来的。但是在冷嘲热讽的方面，也很少有人比得上他。假如他的朋友们能思想，他供给他们很多思想的材料，假如他们不能呢，他们和他的友谊就维持不久。在波特兰，俄勒冈，他的每周演讲是很有名的。听众们坐在悬在一面黑板上的两尺大的命宫图前，詹尼则站在他们前面，用一支教鞭指点那种种的格局，并且要听众解释其中的意义。在一小时半的演讲以后，他就用有趣的故事使他们开心，因为他赋有一种爽朗的爱尔兰式的诙谐。

他的徒从之一，赫尔兹堡的佐·特朗孙，后来成了杰克·伦敦的社会主义同志，他在一九〇九年写道：“他习惯说，‘啊，我从此得到一个意见！’这是他的谈话中迷人的地方。他随即阐明一

种美妙的真理，或一向没有人注意的事实。他在算学和占星学方面是奇妙的；他把解释古代著作的方法教给我。他是一个十足的文法学者，他是渊博的，学者风的，他有出奇的记忆力，他能一天写作十六个小时，不感到疲倦。他时常象我们现代社会主义者那样演讲；他谈到富者愈富，贫者愈贫，也谈到贫穷的原因和补救的办法。他教给我的东西比其他一切人加起来教给我的还要多，他是多才多艺的。一天他对我说道：‘我要教你计算日蚀或任何你愿意学习的科学。’简而言之，任何时候，我要知道什么东西，我就直接去詹尼教授那里。”

特朗孙并不隐藏詹尼的短处。他在音乐方面是无知的；他恨提倡妇女参政的人；他是无情的敌人，也是忠实的朋友，在争吵以后，他不能持公正的态度；他拿“自由思想者”^①的钱，作反对正教的演讲……也不能不沾惹年轻的寡妇。

与芙罗拉·威尔曼合作以后，詹尼在弥申街和伐伦西亚街之间，当时叫作第一号路的地方建立家庭。他参加《常识》(Common Sense)杂志的编辑部(该杂志自称为落基山以西唯一具有“自由思想”的杂志)，写作论文，为勤学会(Philomathean Society)发表了一套社会学的讲演，也替私人算命。

“本教授已定居旧金山，从事占星。凡愿了解此种天空艺术者，本教授可加指引。语及此种天空艺术，当知伽利略^②和牛顿^③爵士皆为此中能手。——本市自称占星家者甚众，实无一人略通此道。彼以占星家自命者，盖皆察验茶杯和纸牌之卜士，至纯正之占星术，因彼辈之鱼目混珠，所受损失甚大也。——讲授时间为上午十至十二时和下午二

① 一种宗教上的派别。

② 十七世纪意大利天文学家。

③ 十七世纪英国物理学家。